

吳頌皋著

外交政策論及其他

黎明書局

吳頌皋著

外交政策論及其他

黎明書局

民國二十三年八月十五日初版

外交政策論及其他

著者

吳頌皋

出版者

黎明書局

印刷者

黎明書局

發行者

徐毓源

發行所

黎明書局
上海四馬路
中市二五四號

代售處

各埠各大書局

版權所有
黎明書局

南漢開濱天北昌口封南津平
掃金豫東會佩城郁方友文齊圖文書書書書
葉山房公司莊社局莊

廈重長杭南廣門慶沙州京州

新北明武中共民新月林南和書書書書書書
社局店店局局

序 言

民國十八年十月，余方自歐洲歸，道經上海，晤及陳布雷先生，時陳先生方主時事新報筆政，爲刊行雙十節紀念特刊，向余索稿，因草「何謂外交」一文以應之。是爲余歸國後第一次撰述關於外交理論之文章。其後掌教滬寧各大學，公餘之暇，輒以討論外交與國際問題之文字刊登時事新報與中央日報。朋輩每譽余所作論文說理明晰，流利可誦，別具風格，余則任興趣之所至，隨作隨棄，片紙無存；即存而閱之，亦覺明日黃花，意義全失。誠以報紙文章與學術文章迥異其趣，文字內容既太半涉及時間性之問題，則一旦事過境遷，誰復注意及斯？

迨前年夏，諸同志倡議刊行外交評論，余欣然參加並以主編者之地位，尤不能不勉力作文。創刊以還，已逾兩載，各家論文，皆蔚然可觀，而余所作評論，亦有數量日增之勢。友人中有慾思余策編成帙，以論文集名義出版者，余則深知前後發表文字，瑕瑜互見，至不一律，與其不加選擇，編成專集，貽識者笑，何如擇其較有瀏覽價值者五篇，合訂一小冊，以作贈送親友之用。商之黎明書局，慨然願任印刷之勞，乃述其顛末如此。海內賢達，倘不明此事爲可鄙，進而教之，則幸甚矣。

民國二十三年七月一日

吳頌皋序於南京

目 次

序 言

- | | | |
|---|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一 | 論外交政策 | 一 |
| 二 | 外交之基本原則 | 三九 |
| 三 | 遠東均勢論 | 六一 |
| 四 | 所謂一九三六年世界危機之檢討 | 八三 |
| 五 | 抵貨辨 | 一一七 |

論外交政策

一 外交政策應以保障國家安全爲出發點

『任何國家立於大地之上，決不能閉關自守，與世界相隔絕。所以民族生活之目的，雖然是求獨立與自由，但此所謂獨立與自由，亦是相對的不是絕對的。易言之，民族的獨立生活之外，又有國際社會的共同生活。如何適應此世界的共同生活，同時非徒無損於民族的獨立生活，且可予以向上發展的機會，便不能不研究外交。故所謂外交云者，決不是尋常的交際，也不僅辦理各項交涉而言，乃是民族爲着對外求生存而不能不運用的一種手段。

（註二）

我對於外交的解釋如此，所以我要明白什麼叫做外交政策，必須懂得什麼是外交之基本原則。所謂外交之基本原則，簡單說來，就是民族根據自己所處的地理環境而決定的對外求生存之基本方針。民族生存之最高目的，依我個人看來，是以全民族的力量造成民族自身的繁榮，進而促成人類全體之繁榮，但欲做到這個地步，非先使民族生存的安全，獲得充分的保障不可。如何可以保障民族生存的安全，除了充實國力，鞏固國防以外，當然不能不注重外交，故就外交之基本原則而論，其唯一對象，即在運用天賦那民族高尚的智力來保障整個國家的安全。外交之基本原則之意義如是，至於外交政策，不過是根據這個方針而決定採取的途徑方法、態度、手段與姿勢的集成而已。方針是恆久不變；途徑方法、態度、手段與姿勢，則有時因國

內政治的變遷，國際形勢的不同，不能不變。所以「樹立原則」應先於「決定政策」等到原則確定之後，任何政策之決定與轉變，不但有軌道可循，且可迎刃而解了。

外交政策既根據外交基本原則而成立，故近代各國外交政策之決定，無不以保障國家安全為出發點。今欲明白此中道理，最好的方法，就是拿英國的外交來做例子。英國的外交政策，雖因時代的變遷而發生幾次轉變，但就其基本原則而言，固仍含有恆久不變的性質。第一就歐陸方面的外交言，英國的基本原則明明是保障英國本部的安全，與維持歐陸的國際均勢。因為她要保障本部的安全，所以不能不和鄰近的國家，維持友誼，避免衝突。這個和睦鄰國的外交政策，一見之於英荷關係之和好，再見之於英葡邦交之密切。十九世紀初年比利時脫離荷蘭而獨立時，法國援助比國，英國則袒

護荷蘭。所以然之故，無非要使荷蘭始終成爲英國的屏藩，藉以阻止法國勢力之北侵。到了一八三一年比利時革命終於成功了，英國便極力主張比利時成爲「永久中立國」，而由英俄法普等國共同担保之。當初目的，原在阻擋法國之覬覦比利時，所以一八七〇年普法戰爭發生之初，深謀遠慮的普相俾士麥，就利用拿破崙第三之垂涎比國的證據的披露，換得英國的確守中立。^{註二}至於一九一四年德軍假道攻法，破壞比利時的中立，結果遂促成英國之助法抗德，那更可證明比利時之得失，關於英國自身之安危，實在是非常重大。到了現在，比利時雖非永久中立國，雖仍有親法的傾向，可是爲英國外交着想，還是有監護比利時之必要。因爲比利時的領土，一經陷入敵人之手，倫敦的防護，即感覺到萬分困難。英國的海軍，亦將失其效力。這樣看來，英國對於比利時政策的決定與改變，實基於保障本部安全的一念，有以使然。

這是十分明顯的事。至於英國所以要維持歐陸的國際均勢，目的亦在保障自己的安全。關於此點，歷史上亦有許多事實可以證明。拿破崙第一權力極盛時代，英國的政策是聯絡普奧，以制法國。結果卒使拿氏敗於英國之手，締結兩次巴黎協定。一八一五年維也納會議成立以後，英國所標榜的「不干涉主義」“Principle of Non-Intervention”，目的固然是對付俄奧的正統主義的外交政策，但其用意却仍在維持歐陸均勢，以保障英國自身之安全。一八七一年普德戰爭的結局，完成了德意志帝國的統一，從此德國國力日強，法國國勢日孤。歐陸均勢之不易維持，昭然若揭。於是英國的外交政策，又變做聯絡法國，以制德國。德皇兩次覬覦法國，菲洲殖民地麻洛哥，都是因為英國的反對，沒有成功。在一九一四年秋，德軍假道比國以攻法國，幸而英法協商(*Franco-British Entente*)早已成立在先(成立在一九〇四年)，

所以能持久作戰，以與德國對抗。戰爭之結果，德國皇室崩潰，革命發生，因有一九一九年凡爾賽和約之簽訂。自此之後，法國圖霸歐陸之心日熾，德國則受了和約之層層束縛，幾有不能立足之勢。於是英國的政策又換一副面目。戰前助法制德，戰後則助德抑法。例如德國之加入國聯，與萊因河駐兵之撤退，都可說是英國實行了袒德政策而發生的自然結果。到了現在，德國希脫拉組閣，軍備平等要求的呼聲日高，已使凡爾賽和約的修改成爲歐洲的嚴重問題。英相麥唐納於提出裁軍新計劃之外，復竭力的拉攏意大利，促成四強公約之締結，以保持歐洲的和平。此種用意，無非想誘使德法雙方讓步，減少二次歐戰的危機，英之重視歐陸均勢，藉以自保安全，於此可見一斑。

第二就太平洋及遠東方面的外交而言，則英國之外交基本原則，亦可以一語概括之，即保護殖民地與本國的聯絡與維持在遠東及中國已得的，

商業利益試舉例說明之。加拿大和美國的領土最接近，所以加拿大一向是對美親善，藉以自保安全。奧大利亞介於美日兩國勢力範圍之間。外交上之應付，比較的稍有困難。但奧大利亞最忌者是日本移民，故親美政策由來已久。一九二一年英日同盟之所以取消，奧大利亞政府之動力居多。故爲奧大利亞一地設想，英之聯美防日，實爲必然趨勢。印度與英帝國之關係尤爲密切，英之重視印度，亦駕乎其他各殖民地之上。戰前爲了防止德人染指印度起見，致有英日同盟之續訂。戰後德國勢力衰微，已不足爲英國之患，故此後之日本，實最有侵犯印度之可能。如何阻止日本之覬覦，亦祇有聯美之一法。故近年來麥唐納所主張之英美海上協調政策，目的就在阻制日本之危害。英國殖民地之經濟利益，照目下情勢看來，英美兩國間經濟的與政治的妥協，能否完全成功，固然尙是疑問，但爲英帝國殖民地之利害設想，舊時英日

同盟之決難復活，要爲識者所公認。至於怎樣維持英國在遠東及中國的利益，則從過去的事實看來，英國所企求者厥爲遠東現狀之保持，與中國政治之安定。十九世紀末年，英最忌視俄國勢力之南侵，因此遂有一九〇二年英日同盟之締結。其後俄爲日本戰敗，遠東地位一落千丈（註三），同時德國遠東政策的進展，却在足以危及英人之利益。於是二次英日同盟續訂之時，一變而以德國爲盟約之對象。歐戰將終，德國在華權利，落於日人之手，日本且乘機侵略中國，銳進不已，於是英又不能不改變政策，拋棄英日同盟來促成一九二二年九國公約與四國協定之訂立。及一九二六年中國國民革命軍進展至武漢時，蘇俄在華之政治勢力方興未艾，英乃毅然放棄漢口租界，以和緩中國人之對英情感。其後如一九二九年中英關稅協定，一九三〇年中英威海衛協定之簽訂，雖然不能認爲英國對華友誼之澈底表示。但其注重

和平主義的協調政策，藉以保持其商業利益，則此點實已予世人以共見。

總之，英國的外交政策，無論是對歐陸或是對遠東，無不適合於她的外交基本原則。因爲原則是一國外交的基本針，所以原則確定之後，各種政策的決定與轉變，便不致影響到民族生存的安全而消失外交的根本效用。英國的情形如此，其他歐美各國亦何獨不然，我們只要留心過去事實，同時觀察現在情勢，就可相信各國外交政策的決定與轉變，莫不以保障國家安全爲出發點。

二 外交政策須有一定的對象

要注意者，就是外交政策須有一定的對象，方能使政策發生功效。須知在世

界真正和平尙未實現，國際利害衝突不易解決之時，民族生存之遭受外力壓迫，乃是極平常事。因此在確定一國的外交政策之先，就應該放大目光，認清那一國在地理上最足以妨害本國的生存與發展。易言之，即誰對我有領土侵略的野心，誰對我是政治的侵略，誰對我是經濟的侵略；凡此都應該明白認識，才能確定方法，指示途徑，竭用智慮，以謀安全之保障。故在決定外交政策之時，外交對象之確定，實為不可缺少。對象確定了，誰是假想敵，誰可以做與國，自然一目瞭然，而所謂外交政策實行起來，自然容易奏效了。

外交對象的重要，在各國外交史中，可以拿不少的實例來證明。譬如以意大利統一時期的外交而論，那時候大外交家加富爾（Cavour）不過是區區沙地尼亞（Sardinia）的首相，他要借用外交的力量，統一意大利，談何容易。然而他是目光遠大，膽識俱備的外交能手。他認清那時候妨害意大

利統一的敵人不是別國而是中歐的盟主——奧大利，故爲反抗奧國起見，不惜犧牲本國的土地，誘使拿破崙第三同他簽訂一八五八年之秘密協定，結果遂使法軍幫助他戰勝奧國，奠定了意大利統一的基業。^{註四}其後爲掃除羅馬教皇的政治勢力起見，遂一變而採取親英政策，利用英國來阻止拿破崙干涉意大利的統一運動。等到法國要想干涉而不能再援助教皇了，意大利的統一也就因外交勝利而逐漸成功了。這便是因爲加富爾認清了外交對象，放胆做去，所以他的外交政策能獲得極大的效果。又如普相俾士麥統一德意志時之外交，其成功之最大關鍵，亦在對象之確定，故外交之步驟不亂，處處佔先着，步步得勝利。一八六四年之對丹麥戰爭，俾士麥利誘奧大利聯合出兵，達到分領休（Scheleswig）霍（Holstein）兩州的目的。實則那時的奧大利，早就是俾士麥外交的對象，故不到二年，又有對奧戰